

民族文物定级的工作原则与实施路径探析

冯正国

民族文物是承载各民族历史发展脉络、民族文化传统以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珍贵物质载体。民族文物是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馆藏体系中极具特色与价值的组成部分。文物定级工作作为博物馆藏品管理的基础性、关键性环节,对于民族文物的科学保护、深度研究与有效利用具有重要意义。相较于其他馆藏文物,民族文物兼具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与社会属性,其定级工作要兼顾标准适配性、价值评判多维性等多个方面,充分发掘其在传承中华文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作用。本文结合国博的民族文物定级实践,就工作原则与实施路径略陈管见,以期抛砖引玉。

工作原则

民族文物定级是一项兼具政策性、专业性与文化性的系统工作,既要严格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遵循博物馆文物定级的通用规范,又要充分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在保障文物安全的前提下,着重强调以下三条原则:

一是依法依规、严守规范的原则。依法依规、严守规范是民族文物定级工作的首要前提。该项工作必须严格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国家法律法规与行业规范为依据,严格按照法定权限、法定程序开展定级工作,杜绝盲目性与主观随意性。与此同时,针对民族文物的特殊性,需结合民族文化相关政策要求,在价值评判、流程操作中兼顾保护民族文化的规定,确保每一项定级环节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而使定级结果具备合法性与权威性。

二是价值考量、多维评判的原则。文物价值是定级的核心依据,民族文物的价值具有多元性特征,定级工作应摒弃单一的价值评判标准,构建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民族文化价值等多维综合评判体系。其中,历史价值侧重考量文物是否见证民族重大历史事件、记录民族社会变迁历程;艺术价值聚焦文物的工艺水准、造型美学,是否为民族传统工艺的典型代表;科学价值关注民族文物在生产技术、工艺传承等方面的研究意义;民族文化价值则突出文物的民俗功能、精神寓意与非遗传承价值,以及在民族文化认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独特作用。通过多维价值综合研判,全面衡量民族文物的多元价值,以确保定级结果能真实反映民族文物的实际价值。

三是尊重风俗、保护文化的原则。民族文物与各民族的文化传统、精神信仰紧密相连,定级工作必须充分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杜绝套用“一刀切”的通用标准。在价值评判过程中,要深入研究民族文物的使用场景和文化内涵,倾听民族文化研究者的意见,尊重民族群体对文物的文化阐释,进一步规范操作流程与表述方式,切实维护各民族的文化权益。同时结合文物存世量、代表性及完残程度等,形成综合评价评估意见。

实施路径

结合民族文物的独特属性与藏品管理的实际情况,民族文物定级采取前期筹备与专家评判相结合的总体思路。前期筹备阶段要逐一核对文物实物与现有档案,有序摆放每一件拟定级的文物,梳理文物的征集来源、收藏来源、文物族属、流传经过、品相完残、修复记录等基础信息,整理前人的研究成果、民族口述史料及相关文献资料,结合文物账目、文物卡片制作拟定级文物清单。专家评判采取召开定级会议的工作模式,通过现场查看拟定级的民族文物,专家组对初步定级意见进行集体讨论,就文物名称、年代、纹饰、材质、功能、价值等信息进行逐个核查修正、补充完善,形成最终定级意见,确定文物级别。在民族文物定级过程中,以下四个方面需要重点关注:

一是民族文物的年代断定与跨年代问题。部分民族文物通过征集、捐赠等方式入藏博物馆,其流传经过可能不明确,年代标识不清,也缺乏相关的文献佐证,年代断定难度相对较大。与此同时,尽管一些民族文物有明确的时间标识,但使用的是本民族独有的纪年体系标记时间。纪年体系是一个民族时间观的集中体现,在具体的定级过程中,为了更好地进行价值考量,也需要与现行的历法体系进行转换。还有民族文物的跨年代问题。一般而言一件民族文物应有其确切的存在年代,但有的民族文物基于特殊的功能情境可能会跨越不同的年代,如征集于云南宁蒗的曾万成顶地契,其立契时间为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日,而验契时间为民国三年十月,这种跨越了清代、民国两个时期的民族文物本身就是制度变革的实物证据,从而成为研究民族地区社会转型不可替代的珍贵材料。

二是民族文物中少数民族文字的释读。在民族文物定级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字释读是进行价值考量时所面临的瓶颈。只有正确的文字释读才能判断其是否涉及重大历史事件,还原真实的历史与民族关系信息,进而才能确保定级工作的科学性、公正性与文化完整性。如国博馆藏道光二十二年世袭滇州知州印,该印为满汉双体文方形铜印,印文左右两侧分别为篆书满、汉文“世袭滇州知州印”。在对该铜印的定级工作中,得益于对满文的准确释读,判定该印作为清代滇隶土司复袭土知州的实物见证,且为滇隶土司地区仅见之官印,认定其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研究价值。

三是多件民族文物的联合考察。基于独特的社会情境与民族属性,民族文物往往成套或成批出现,诸如基于某仪式场所所使用的成套文物组合,某一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内所使用的生产、生活器具,以及反映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文物等。在此类民族文物的定级过程中,要注重多件文物的整体价值,把握其系统性与文化关联性,比如是否能成组说明某一历史问题,完整讲述一个民族文化故事,是否能反映某一序列的制造工艺与操作流程,是否承载着某种民族文化或精神寓意等。在此基础上考察其稀缺性、典型性与保存完整性,进而定出相应的文物级别。例如国博成套保存的畲族十殿图,是展现畲族祖先崇拜与丧葬仪式的宝贵实物资料,也是畲、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物证。

四是溯源民族文物的社会情境与田野调查。民族文物进入博物馆,由物品转变为博物馆的藏品或展品,其存在的社会情境发生了变化,如何评估其在原生情境与博物馆情境中的价值,是民族文物定级过程中必然面临的问题。比如民族文物在其原生情境中,基本功能作用是什么,是作为生产生活用具还是仪式道具等,依此明确其核心用途与社会角色。民族文物被征集至博物馆,使文物脱离“器物”的属性而转变为“文化符号”的象征,其中体现出了民族文物的活态性与连续性。在此基础上,赴民族地区进行实地的田野调查就显得尤为必要,沉浸式进入生活场景,现场记录文物的日常状态,捕捉民族文物存在的活态语境,使之与博物馆情境进行对比分析,进而能够更好地确定民族文物的多维价值,巩固发展民族文物定级的成果。

综上,国博的民族文物定级工作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为方针,遵守我国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立足民族文物的本质属性与文化特征,形成了规范有效的工作原则和完整清晰的实施路径。通过民族文物定级工作,让民族文物更好地走出库房、走向大众,展现各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与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文博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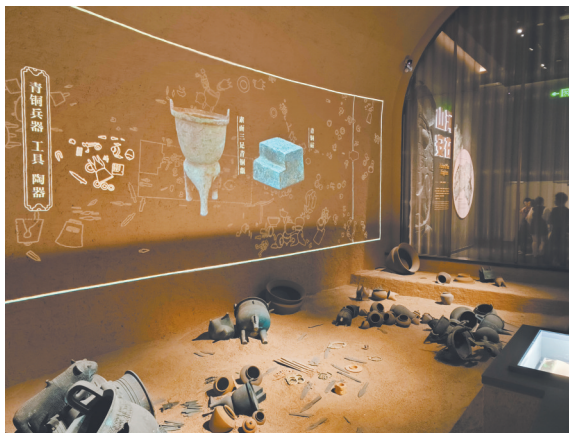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馆藏文物定级

本版责编:何薇 甘婷婷 王龙霄

青铜文化视角下博物馆展陈要点分析

邢琳 陈书迁 谢飞



长江流域自古便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之一,不仅孕育了悠久的稻作文明,还构建起南方青铜文化的辉煌。作为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西以丰富的铜矿储量和精湛的冶铜技术而闻名。考古发现表明,至迟在商代,江西先民便开始对铜矿资源进行开采与利用,呈现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特征。这些与青铜文化相关的遗物,诸如青铜器、采冶工具以及携有相关文化因素的各类器物,被系统地收藏在博物馆中,构成博物馆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核心组成部分。作为江西青铜文化的核心展示窗口,江西省博物馆“虎踞江南——新干大墓与青铜王国”展览(以下简称“虎踞江南”展览),依托江西商代青铜文化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有益的展陈探索与实践。

商代江西青铜文化的内涵

商代江西青铜文化的内涵包含铸造作坊在内或依附铜矿而发展的大型城址;出土一定数量青铜器的大中型墓葬或祭祀遗址;具有完整采集、冶铸工艺流程的铜矿遗址和相对成熟的冶铸技术;器型完备且兼具中原和地方文化特色的青铜器等。青铜制作技术主要包括采、冶、铸三个主要环节。瑞昌铜岭发现采矿、冶炼遗迹,荞麦岭遗址发现冶炼、铸造的遗迹遗物,樟树吴城遗址、新干牛头城址发现陶范,新干大洋洲商墓及其周边发现的大量青铜器,涉及古代采矿、冶炼与铸造等关键环节,足见江西金属冶炼技术发展之早,水平之高,技艺之精。

瑞昌铜岭周商矿冶遗址,是迄今南方地区已知最早的采铜点,确证江西铜矿资源丰富,且冶铜业从商周时期就处于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通过发掘材料来看,矿山的开采年代由商中期延续至周代,连续开采超过千年。从选矿、采矿遗迹及遗物的具体情况分析,该遗址大抵可以分为商代、西周、春秋、战国四期。经由对商代文化层出土陶器的考古类型学研究,比对樟树吴城、上饶万年、鹰潭角山等遗址同时期陶器的文化因素可知,该遗址商代遗存以中原商文化为主,兼有少量地方越人文化因素,且在商早中期就属于集开采、冶炼为一体的大型铜矿。

樟树吴城商代遗址,出土犁、器盖等青铜礼器和戈、矛等青铜兵器,发现铜渣、陶范、石范等与铜器铸造相关的遗物以及冶铸遗迹,体量不大但特征鲜明。李伯谦等专家通过对印纹硬陶分期分区研究,认为吴城文化既表现出强烈商文化因素,与中原商文化有密切关系,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且随着时间发展其独立性愈发明显。吴城遗址出土模范上花纹的形制与青铜器花纹高度吻合,证明这些青铜器是在本地铸造的。换言之,吴城先民已掌握青铜冶铸技术。根据发掘报告中考古学分期研究,推断其青铜器遗存约属吴城二期(相当于殷墟一期、二期),地方土著特色已较为明显。专家普遍认为,吴城文化铜冶业发达与瑞昌铜岭采冶技术不无关系,商中期瑞昌铜岭铜矿完备的采矿技术体系,为吴城文化青铜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物质基础。

新干大墓的发现,证实商代江西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墓葬年代相当商晚期偏早,墓中出土475件青铜器,涵盖礼器如鼎、鬲、甗,乐器如铙、铎,以及兵器、工具、农具等类别。学界研究认为,新干大墓礼器受中原商文化影响,并进一步有选择性地接纳与融合,而农具、兵器等地方特色明显,甚或存在对中原地区青铜文化产生影响、渗透的可能性。新干大墓与牛头城城址相距约3公

里,同处赣江东岸古淦水附近,据此推断新干大墓的主人与牛头城城址密切相关。从新干大墓、牛头城城址出土的陶器风格十分接近的特点分析,它们同属吴城文化的范畴。可见大约殷商时期,以吴城遗址——牛头城遗址为中心,存在一支高度繁荣的青铜文明。

吴城、牛头城等城址规模巨大、等级很高。不仅具备人口集中的特点,且功能分区明显,制陶、冶铜等手工业技术明显进步,并逐步专业化。而祭祀遗迹、文字符号、兵器的发现,也进一步证实该地区已经进入文明社会。两地原始陶器上都刻画有“戈”字符,或认为是远古戈人的族徽,是其活动或迁徙的写照。新干大墓青铜器上丰富的“虎”元素,吴城城址出土的“雀”形陶符,表明以牛头城为代表的虎方,以吴城为代表的雀方,以及戈人等,他们是这一区域内复杂而多元民族融合的代表,共同构成了江西商代青铜文化的核心。该区域青铜文化最初受到中原高度发达青铜文化的影响,在吸收其精华的同时,进行了借鉴并融合创新,最终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这种文化的交织互动、此消彼长,正是赣鄱地区融入中华多元一体青铜文化的生动体现。

博物馆展陈融合青铜文化研究的要点

博物馆新定义提到,“博物馆是为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它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博物馆与田野考古紧密关联、相互支撑,如何展示好江西青铜冶铸技术起源和青铜文化发展,进一步阐释、传达青铜文化内涵,“虎踞江南”展览应时而生。

其一,强化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博物馆展陈理论的可行性,建立在充分且科学的理论研究基础之上。全面掌握研究动态,深入理解业内最新、普遍认可的研究成果,是确保展览内容准确性和学术性的前提。“虎踞江南”展览以新干商代大墓为切入视角,从一座墓,一个方国,一支考古学文化的主线出发,设置了“王者归来”“山河安在”“回望繁华”“融汇多元”四大展览板块,陈展脉络清晰。“王者归来”通过对墓葬元素的分析,清晰地让观众了解这就是一座王级大墓;“山河安在”通过阐述江西清江盆地商代遗址的情况,梳理了新干大墓、牛头城遗址、吴城遗址之间的内在关联,说明该区域是江西青铜文明的核心区;“回望繁华”结合铜岭遗址、吴城遗址出土的采冶工具,新干出土青铜器的科学检测结果,明确商代赣鄱流域已建立起完备的青铜器

“简载华章——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展”展览手记

陈彪



战国简牍文字博大精深,是当古文字学术研究的热门领域,学术成果丰硕,但对于普通大众而言,简牍文字晦涩难懂,为了让两千多年前书写在简牍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宣传简牍文字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中国文字博物馆和安徽大学联合主办了《简载华章——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展》。展览主要展示了《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简称安大简)第一、二辑共150枚竹简的内容,分成“初识竹简”“学诗以言”“夫子诲语”“论军问政”四个单元,展示阐述《诗经》《仲尼曰》《曹沫之陈》三部文献和重要学术研究成果。

以字为媒,连通古今,展示学术成果

中国文字博物馆是以“文字”为专题的一级博物馆,本次展览以展示战国竹简文字为主,充分体现了“文字”这一主题。安大简距今两千多年,竹简上的文字与我们今天的文字有很大的区别,比如一字多形和假借破读的现象,还有很多通过安大简才得以识别疑难字,等等。如何将这些晦涩难懂的学术研究成果深入浅出地解释给普通观众,让文字“活”起来,是策展团队面临的首要难题。为此,展览遴选了简牍中大众相对熟知的内容,用图文和漫画结合的形式进行展示。同时,展览设计了“安简”卡通IP形象,让它与孔子进行对话,还设计了曹沫和鲁庄公的形象,做成漫画宣传册赠送观众,便于观众更好地熟悉和了解展览内容。

对于《诗经》这样文学艺术化程度高的作品,策展团队从内容和文字两个部分考虑,以“异文新解”和“字词考释”为题,展示最新的重大学术研究成果。异文选用了“窃窈”“硕鼠”“鸛”“鸛”“鸛”等这样耳熟能详的内容,展示安大简所记录的《诗经》与如今所学通行本《诗经》的不同之处。比如“窃窈”,在安大简中写成“要窈”,并非传统联绵词解释为娴静之意,而是指腰身美好。“要”就是“腰”的本字,像两手叉腰样子。展览展示了“要”从甲骨文、金文到秦汉隶书的演变过程,揭示了战国文字在汉字的发展演变历史中的重要作用,让观众能直观地感受到汉字形演变的历史。此外还有“硕鼠”并不是指“大老鼠”,而是一种叫“蝼蛄”的昆虫,诸如此类有趣的内容,能够引发观众强烈的好奇心。字词选用了“沉”“兕”“倾”“茁”“修”“瑱”这些比较便于形象通俗解释的字来展示,如“沉”字在安大简中写成河中沉禾苗的样子,目的是祭祀河神,祈求丰收,并延伸讲述了甲骨文和简牍文字中祭祀所沉在河中的其他祭品,比如牛、羊、玉、人、贝等。

展览中,无论是展板上内容还是墙上装饰的竹简图片,对于竹简记载的文字都在旁边做了释文,特别是在如《关雎》《桃夭》这样名气比较大的篇章中,还附上了今本毛诗和简本释文的对照内容,让观众能够对古今《诗经》的不同之处和安大简的重要价值一目了然。

此外,为了让大众了解安大简文字的研究工作,展览还配套举办了安大简相关的专题学术讲座,讲述安大简收藏保护研究的过程以及安大简的学术研究成果。同时,展厅中以视频的形式循环播放古文字研究专家对安大简的讲述,进一步加深观众对展览的理解。

字在景中,景在字里,营造别样体验

展览打造了《关雎》和《桃夭》、孔子教学、战国车马战争等场景,观众步入展厅恍如身临其境。为了让观众了解两千多年前战国时代的文字和语言与当下的差异,使观众理解语言文字是随着历史不断发展变化的观点,在《关雎》场景中搭建了一个亭凉,并在亭中安装了三部电话,拿起电话便能听到不同时期语音朗诵和歌唱的《关雎》,包括上古音唱诵、中古音诵读和现代普通话歌曲。当观众拿起电话,听到模拟两千多年前的上古音唱诵的《关雎》,看着场景中安大简上用战国文字书写的《关雎》诗句时,仿佛与我们的老祖宗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交流。

在《桃夭》这个场景中,营造了桃花纷飞的美丽景象,配上竹简上《桃夭》的内容,观众可以在场景中拍照留念,还可在展览准备的竹片上临摹古文字,写上充满

生产体系,以及丰富多样的生业形态;“融汇多元”则是通过江西青铜时代各遗址文化面貌的对比,论证铜料的流通与青铜文化传播方式、路径,以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

其二,注重文物资源的优势互补。展品是陈展的物质基础,展品的合理配置,既体现了文物资源的丰富度,更是策展人对展览背景的认知和理想化的思考。“虎踞江南”展出展品囊括了新干大墓出土大部分遗物,瑞昌铜岭遗址、吴城遗址、角山遗址的部分遗物。展品的来源不仅限于江西省博物馆馆藏,还依据既往的科研成果与观点,借调相关文物,以强化展览的学术支撑与论证力度。譬如,通过青铜兵器、青铜犁铧以及陶网坠等文物,阐述商代江西的军事征伐与统治、稻作农业以及渔业活动的面貌;瑞昌铜岭采矿场景的复原和孔雀石、冶铸工具等展示,揭示商代江西青铜采、冶、铸技术的脉络;通过省外借展的甲骨,识读甲骨文中“虎方”相关记载,并结合吴城遗址出土刻有“戈”字符的文物,阐述学界关于“虎方”“虎国”以及“戈方”的既有推论与学术论证。这些举措,保障了展览的深度、厚度和广度。

其三,妥善处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人”(观众)与“物”(藏品)之间的关系,是博物馆陈列展览的价值归宿与实践落脚点。在当下博物馆实践研究的学术语境中,逐步从“以物为中心”走向“以人”的理念转变。这就要求博物馆展陈一定程度上要以受众为导向,引导“人”通过看“物”获取有效信息。“虎踞江南”展览的内容与形式设计,充分考虑不同受众群体的需求差异。一方面,其学术性较强,囊括大量学术观点、线图表格,能够满足科研人员这一目标专业受众群体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视觉符号提取、展览动线规划、互动展区设计以及数字化的展示手段,将文物所承载的历史信息、文化价值及艺术魅力,以更为直观、生动的方式呈现出来,兼顾了社会公众的观展需求与体验。

综上,基于我国青铜时代所蕴含丰富的考古学文化内涵,以及早期中国“多元一体”“辐射四方”等理论框架的支撑,博物馆展陈与青铜文化研究之间的融合处理显得尤为重要。从某种程度上讲,“虎踞江南”展览将理论研究、文物展示、“人与物”关系处理等核心要素融入实践,整合了学界对商代江西青铜文化研究的主要成果,为探究长江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探究青铜文化研究及博物馆展陈的内在逻辑,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案例。

(作者单位:江西省博物馆 摄影:罗琳)

爱意的竹筒话语,用红绳将竹片系在场景中的桃树上。这样浪漫的体验,吸引了很多情侣前来观展互动。

以字寄情,玩物益智,扩大展览影响

为了扩大影响力,展览配套设计了多款精美的文创产品,有安大简“君子”“淑女”文字的折扇和香囊等,备受观众喜爱;印着竹筒文字吉祥语的饼干,将其做成竹筒的形状,放置在像抽签筒形状的包装盒里,观众可以摇签认字,边吃边玩;精选“夕夕何夕,见此良人”“我念君子,温其如玉”等文字内容,制作冰箱贴和书签;选取《仲尼曰》中的格言警句,如“君子见善以思,见不善以戒”等内容印制手提包,等等。这些文创产品既起到了宣传战国竹简文字的作用,同时借助文创产品阐释传播安大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识字竞技,寓教于乐,社教活动增强互动

为了增强展览的影响力和观众的参与感,团队还结合展览内容设计了相应的社教课程,组织青少年参观展览,书写竹筒。同时在展厅设置了展览互动游戏区域,设计了识字投球游戏。观众只要将小球上的现代汉字与安大简中的战国文字投球对应成功,便可获得一份文创礼品。这种展览内容与游戏相结合的方式,使得高深晦涩的古文字展览变得生动有趣,进一步增强了观众的观展热情和品读意愿。

(作者单位:中国文字博物馆)